

# 晚清内陆地区西学东渐的三个阶段及其影响

## ——以晚清安徽为个案

宋曲霞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内容摘要】晚清安徽的西学东渐经历了起步、发展、兴盛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反映了西学在安徽传播经历的由少到多、由慢变快、由浅入深以及安徽社会对西学的接受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安徽是一个农业经济比较典型、传统文化因素比较丰富的内陆省份,因而其西学东渐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自有其区域特征,而正是这些区域特征透视出了内陆地区西学东渐及其近代化进程与沿海发达地区所存在的差异性。

【关键词】晚清 安徽 西学东渐 内陆地区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4-0117-04

近年来,学界对晚清西学东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这一研究是全国视角探讨得多,区域视角探讨得少;沿海地区研究得多,内陆地区研究得少。要真正地认识西学东渐对晚清社会影响的程度,对内陆地区西学东渐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安徽作为一个内陆省份,西学在晚清安徽的传播及所产生的影响,在内陆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本文试以晚清安徽社会为研究对象,对晚清安徽西学东渐作一点考察,力图完整地描绘出晚清安徽西学东渐的一个概貌,以求更清楚地认识晚清内陆地区西学东渐的历史。

一、晚清安徽西学东渐的起步阶段(1865—1876年)

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首先在安徽传播的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但与沿海地区不同的是安徽地处内陆地区,又是太平天国的主战场,因此作为西学传播主体之一的传教士来的较迟。1865年以后,天主教等传教士才以五河、安庆及婺源县的东门镇、宣城的水东镇为据点进行传教并逐渐向周围地区扩张。1869年,新教内地会传教士也来到安庆,租下民房15间作为“圣爱堂”。到1876年之前,以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利用武力和外交的

支持,“在安徽省的十一个府治中已进入到九个府”<sup>[1](P347)</sup>。

传教士在安徽传播基督教文化的方式一是直接向人们布道。如常驻安庆的法国神父韩石贞,“住在那座简朴的住院里”<sup>[1](P117)</sup>,常以采集动植物标本为名,远行到偏僻的乡间,进行宣传教义的活动。内地会的两个英国牧师密道生和卫养生,则经常站在教堂的门口,或出没于大街小巷,唾沫横飞地向人们“布道”<sup>[2](P55)</sup>。二是以办施诊所、学校等慈善事业为传教手段。如最早来安庆进行活动的中国籍神父熊臣尧在秘密买下一座房屋后,找来一位信教的医生,以给人治病为名,进行传教活动。1873年,宁国府所设的27座教堂中已附设教会学校22所,学生337人。

最早接受基督教文化的主要是一些生活无着落的贫苦农民和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从湖北等地招来垦殖的客民。一是因为基督教宣扬的原罪说和来世说满足了这些无依无靠的贫苦农民的心理需要。社会上最无助最怨恨的人,是最易接受宗教的人。二是因为农民固有的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在农民看来,只要能给他们带来实惠的、好处的东西,都是可以接受的。如叶春荣神父在1869年多次去宁国府,给他们大量的经济援助,“这些

\*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9sk085)。

\* 作者简介 宋曲霞(1963—),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受苦人真把他当作救命恩人”，“到 1869 年底，约有三百名教友聚居在许村、芦村、水东三个相邻的村子里”<sup>[1](P176)</sup>。

下层民众接受基督教文化时的功利性，使得他们往往缺乏坚定性。因此，传教士更希望的是官绅阶层的加入。但安徽官绅们对外来的西方文化有着本能的抵触，如 1869 年发生的安庆教案，主要参与者就是一批文武考生；1876 年发生的皖南教案，幕后指挥者是一位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以攻教为己任”的乡绅——何渚。安徽巡抚乔松年在 1866 年谈到西教时也说“其为教也，以不事神不祀先为首务，悖理败伦，凡有识者皆所深恶，彼僧人道士，亦属异端”<sup>[4](P82)</sup>。乔松年的反教态度，代表了当时多数官吏的心态，透视出晚清安徽官绅在西方文化初入时的抗拒和排斥倾向。

由于传教士来的较迟，加上来皖的传教士不多，精力有限，为安徽人提供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的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还未完全展开。因而这一阶段的传教事业并不很发达，与其他省份相比，教堂总数、教民人数、教民占总人口比例，都处于靠后的位置。西学对安徽的影响此时还不小。

## 二、晚清安徽西学东渐的初步发展阶段(1876—1905 年)

一是商业贸易成为这一阶段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途径。1876 年 9 月《烟台条约》签订，芜湖开辟为通商口岸。“在外人未入内地经商以前，即经济方面也不与外邻发生何等关系，至政治方面更无论矣，与外商发生直接关系之始，厥为芜湖租界之辟。”<sup>[5](P1)</sup>从此，安徽尤其是长江流域地区被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开放与西方文化的传入也是同步的。首先，芜湖开埠后，在与外商进行商贸活动中，近代海关制度、税收制度及商业理念、价值观念等逐渐被带进了安徽。其次，芜湖开埠后，在大量的外国商品进入安徽，冲击了安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的同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开始被引进来了，如 1877 年杨德创办了安徽第一个近代矿业池州煤矿。再次，芜湖开埠后，在芜湖的外人明显增多，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近代设施也跟着建立起来了，如教堂、医院、学校、电讯、邮政、交通等。总之，芜湖开埠，安徽真正开始了与西方文化的直接对话和碰撞，西方文化通过商贸活动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到了安徽。

二是宗教传播仍是这一阶段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途径。芜湖开埠后，基督教势力在安徽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传教成功，传教士把办学校、办医院作为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据统计，到 1908 年，“外国教会在安徽各地办有小学 104 所，教会中学 7 所”<sup>[6](P13)</sup>。影响较大的有歙县的崇一学堂，芜湖的广益学堂、育英学堂，安庆的座堂学堂，怀远的淮西学堂等。在安徽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办的诊所和医院达 74 所之多。影响较大的有芜湖的“弋矶山医院”，合肥的基督医院，安庆的同仁医院。

首先，这些教会学校在教学内容上，一般都设有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课程，如崇一学堂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sup>[7](P330)</sup>；萃文中学堂规定学生必修课为圣道、英文、算术、代数、形学测绘、理化、天文、生理学、修身、舆地、国文、音乐等<sup>[8](P320)</sup>。教会学校把西方的新知识、新技能传到了安徽。其次在教学方法上实行分科、分班、分级教学，讲究教学的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循序渐进。教会学校将西方的教学方法和近代的教育体制引进到了安徽。再次，在学生的出路上，学生把毕业后能到洋行、货栈、海关、码头、邮电等时髦而高薪的部门去任职，看成是最好的出路<sup>[8](P334)</sup>，而不是去做官。教会学校把西方新的价值观念带到了安徽。

教会医院把与中医有着完全不同文化特质的西医带到了安徽。更重要的是，近代西医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所提供的精神养料的基础上的，提倡的是以人为本，以人为尊。教会医院以它所代表的先进的科学知识和高明的技术及人道主义，成为当时安徽人认识和体验西方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的窗口。

三是官绅开始成为安徽西学东渐主要的受传者和再传者。首先是一批在外的皖籍官员和在皖现任官员接受并积极倡导西学，如合肥人李鸿章在自己家族内鼓励自己的儿女学习西学，“近在上海设方言馆，聘请外国之名士为教授，专授外国语言，吾儿待国学稍成之时，可来申学习西文，……吾儿他日当尽力研求之”<sup>[9](P148)</sup>。寿州人孙家鼐在维新运动期间，支持其侄、孙在寿州办“阜财学堂”、寿州公学，开设英文、国文、数学、地理、体育、图画等课程。桐城人吴汝纶，在保定时，就办了专为培养皖籍在北子弟的中学堂，前往日本考察时，他特意从桐城招来李光炯、房秩五等 5 位青年，随同前往，在暮年之际还回到自己的家乡，创办了安

徽最早的中学堂之一——桐城学堂。该校课程仿西制,增设了外语、数、理、化、博物、中外史地等课程。维新运动时,任安徽巡抚的邓华熙、芜湖道员的袁旭,不仅允许维新派的报刊进入安徽,如维新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报纸《时务报》在安徽就有9个代销点,共代销《时务报》25628<sup>[10](P87)</sup>,而且还于1898年创办了安徽第一所新式学堂——求实学堂,以培养新式人才。

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倡导和推动下,一批学子在维新运动后出外求学,开始系统接触西学,如陈独秀“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日非而今日是。”<sup>[11](P214)</sup>1898年,他到杭州去求学,从此开始了学习西学、传播西学以开启民智的道路。柏文蔚在维新运动后,开始阅读维新书刊,后到安庆系统而广泛接受了西学教育和西方的民主思想的;绩溪的胡晋接,本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硕儒,维新运动后,认为“非变法维新,国家不足以图存,欲改造中国,非先改造中国之思想界不可。”<sup>[12](P72)</sup>因而开始致力于新式教育以传播西学。他们是安徽较早地接受西学的一部分人,也是下一个阶段传播西学主力军。

三、晚清安徽西学东渐的兴盛阶段(1905—1911年)

一是新式学堂成为传播西学的主要场所。安徽的新式学堂最早是1898年设立的求是学堂,而发展是在科举废除后。据现有资料统计,安徽全省的学堂,1903年有13所,1904年有41所,1905年有80所,1906年有198所,1907年有293所,1908年有503所,1909年有723所<sup>[13](P2)</sup>。

这些新式学校,与过去书院、私塾最大的不同是办学的宗旨不一样了,不是为了培养封建官僚士大夫,而是以传播西学、培养西学人才为主,如求是学堂在奏请办学的奏折中就明确表示“今之宜讲求西学,以造就人才。”<sup>[14]</sup>安徽师范学堂创办时,巡抚恩铭亲临视察,并训导学生“讲求根柢,学贯中西,养成全才,楷模后进”<sup>[15](P500)</sup>。严复在开学典礼的演讲中,建议在课程开设上,应“洋文功课占十之六七,中文功课占十之二三”。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既具有西方科学知识又拥有西方文化精神的人才,这些人才毕业后或走向教坛、或走向政坛、或走向新闻报刊杂志、或走向工商企业,但不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他们都成了西学的再传体。

二是报刊成为传播西学的主要方式之一。据

笔者所能找到的资料统计,在辛亥革命之前,安徽所办的报刊有近二十种<sup>①</sup>,影响较大的如陈独秀于1904年办的《安徽俗话报》、李辛白于1908年办的《安徽白话报》等。当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报刊,也先后传入安徽,如维新派办的《新民丛报》,革命党办的《民报》,上海《申报》、湖南《湘学报》等。

传播西学、开通风气、启牖民智是这些报刊的主要目的。如以安庆为主要报道对象的《安徽白话报》,其宗旨就是“开通风气,使人人得有普遍知识,对于国家有权利义务之思想,对于外国有争存竞胜之精神”<sup>[16]</sup>。陈独秀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一文中,明确表示“我开办这报,是有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安徽人听听”,“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sup>[17]</sup>。在这种办报宗旨下,这些报刊以评论时政、介绍新知、探索求强求富之道为主要内容,如《安徽俗话报》,共有十六门,包括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谈、行情、要件和来文。该报很受读者欢迎,特派处在省内最多时达46处<sup>[18]</sup>。省内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师把《安徽俗话报》作为开化学生思想的教本,少数开明的地方官吏,也利用它来开化群众,如绩溪知县就以官府的名义“捐廉购办,随同官报发行,听人采取”<sup>[19]</sup>。

三是留学生成为西学传播的主体之一,民主革命思想成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安徽留学生传播西学的方式最主要是参与新式教育与办报刊。如潘赞化回国后于1906年捐资兴办桐城堂会学堂,房秩五回国后与李光炯创办安徽公学,刘希平、光明甫从日本回国后参与筹建江淮大学。徽州地区办的最早的一所新学堂——绩溪县仁里私立思诚两等小学堂,聘请了两位留日学生江鹏萱、程仲圻任教员<sup>[13](P70)</sup>。1908年在省立师范学堂担任监学或教员的有六位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安徽公学先后聘请了多位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和学者前来任教。陈独秀与房秩五等办《安徽俗话报》,高语罕帮助韩衍编《俗话报》和《安徽白话报》,李辛白回国后在上海主编《安徽白话报》等。

这些留学生在海外除了接受西学知识外,又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因此回国后,无论是在新式学堂任教还是主办报刊,他们对西学的传播已不仅限于自然科学,而是深入到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如陈独秀不仅在《安徽俗话



报》上发表了诸如《瓜分中国》、《亡国篇》、《说爱国》等文章,而且在安徽公学任教时,组织成立了岳王会,宣传民族思想。留学生推动安徽西学东渐进入了高潮时期。

#### 四、一点认识

在西人传教、通商、设学、施医的冲击下,在一部分开明官员、进步士绅、新式学堂学生、留学生等努力和推动下,安徽的西学东渐以1876年芜湖开埠和1905年科举制废除为转折点,经历了起步、发展、兴盛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反映了西学传播经历的由少到多、由慢变快、由浅入深以及安徽社会对西学的接受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晚清安徽西学东渐既有与全国西学东渐发展相一致的一面,也有安徽自身发展的逻辑性。一是从时间上看,由于传教士来的迟(1865年以后),口岸开放的较迟(1876年),士绅阶层接受西学较迟(维新运动前后),因而与沿海地区相比具有滞后性;二是从地域上看,只是呈零散分布在几个点上,如安庆(政治文化中心)、芜湖(唯一的开放口岸)等地。由于交通的限制和经济的落后,相互之间在经济上、文化上的联系不密切,对周围地区的辐射效应有限;三是从内容上看,由于安徽赶上的是1900年以后的这一西学传播潮,而此时革命风潮已起,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成了最主要的使命,因而体现出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时代特征;四是从传播途径上看,虽有宗教传播、商业贸易传播,但影响最大的是官僚、士绅、留学生通过新式学堂、报刊的传播。而他们的西学主要是从日本、江浙等沿海发达地区转口而来,因而不够直接、全面。由于安徽是一个农业经济比较典型、传统文化因素较丰富的内陆省份,要使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相应地就需要更多的外来因素的推动,但上述安徽西学东渐自身的特点,削弱了这一推动力,导致了西学东渐在安徽产生的效应有限。西学东渐是近代化启动的一个原动力,西学东渐的效应无疑是影响安徽近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晚清安徽西

学东渐及特征,透视出了安徽近代化之所以步履蹒跚的些许端倪,也透视出内陆地区西学东渐及其近代化进程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异性。

注释:

①据《芜湖市志》、《安庆市志》、《芜湖文史资料》,第一辑、《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五辑、《安徽文史集萃·文教史踪》等编制。

参考文献:

- [1][法]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2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 [2]安徽革命史话[M].合肥:黄山书社,1987:55.
- [3]沈葆祯.研讯皖南教堂滋事确情分别示惩折.《增订教案汇编》卷2[M].
- [4]教务教案档(第1辑)[M].74.转引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M].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 [5]安徽通志稿.外交考.绪言[M].安徽通志馆编印.
- [6]安徽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安徽省志·教育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 [7]姚启安.姚文采先生事略[A].歙县文史资料(第2辑)[C].歙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7.
- [8]司旌霞.芜湖萃文中学的风云[A].安徽重要历史事件丛书·教坛古今[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
- [9]周维世主编.清代四名人家书[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
- [10]郑大夫.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M].上海:三联书店,1995.
- [11]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12]李兴富.二师创建者胡晋接[A].休宁文史(第1辑)[C].休宁:政协休宁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97.
- [13]张耀宗,章艷华.清末安徽教育概述[A].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之六《文教史踪》[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 [14]高正方.清末安徽新教育[J].学风,第2卷第8期.
- [15][清]冯熙主修.皖政辑要[M].合肥:黄山书社,2004.
- [16]安徽白话报简章[N].安徽白话报,1909(1).
- [17]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N].安徽俗话报,1904(1).
- [18]本社特告[N].安徽俗话报,1904(5).
- [19]安徽俗话报,1904(7).